

论多克托罗纽约书写的文化内涵

袁源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上海, 201209)

摘要: 美国后现代派作家 E. L. 多克托罗的多部小说都以纽约为背景, 书写普通纽约人的生活。通过解析多克托罗借助小说绘制的纽约文化地图, 探讨他对纽约曼哈顿、布朗克斯区及曼哈顿的下东区不同态度背后的文化动因, 指出他旨在将自己的“犹太裔”“美国人”“纽约客”这三种身份合而为一, 他的视野也不仅仅局限于犹太移民, 而是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如何共生共存的情况, 具有“混杂性世界主义”的特征, 因此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都市美学, 彰显出他与美国其他后现代派作家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 E.L.多克托罗; 空间; 都市; 纽约; 文化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2-0180-06

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E. L. Doctorow, 1931—2015)(以下简称“多氏”)以其政治小说、历史小说著称。他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两次、全国书评家协会奖、笔会福克纳奖和美国全国人文科学奖等诸多荣誉。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认为多氏是“美国小部分严肃的左翼小说家”之一。^{[1](462)}由于多氏小说对政治和历史高度关注, 不但他本人被认为是“激进的犹太人文主义者”, 对其作品的评论也多局限在以下四个方面: 小说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小说中的政治介入、历史小说的后现代风格及犹太主题研究。综合看来, 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线性角度切入, 从本质上而言是属于“时间性”的。然而, 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 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指出: 多氏的历史小说将读者带回到“历史空间”, 并且在“历史知识”和“艺术景象”之间建立了一种“叙述的辩证关系”。^{[1](465)}而杰西·祖巴在《纽约文学地图》中则提醒到: 多氏的小说大多以纽约为背景, 并且以普通纽约人的生活为其后现代书写的对象^[2]。在肖恩·奥康纳的《引人注目却难以言表的纽约: 一部文学史》一书中, 奥康纳认为多氏的小说中融入了纽约的城市发展史。^{[3](13)}作为出生在纽约的第三代犹太移民, 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 多氏见证了纽约这个城市的发展历程, 因而在其作品中极为细腻且不无委婉地记述了这个过程。正如其小说《上帝之城》(City of God, 2000)的中译者所指出的, 多氏的小说大多关注

的是“城市的和种族的历史”。^[4]因此, 研究多氏小说中的历史意蕴、政治意图、犹太主题、传记策略等都不能脱离纽约的都市现实, 更不能忽视他作为“纽约”作家的身份。他在小说中通过各种独特的叙事视角建构了一种独特的都市美学。下文将结合文化地理学相关理论探讨他如何通过小说绘制纽约的文化地图, 通过分析作家本人对纽约都市空间的文化解读, 总结其后现代都市书写的文化内涵。

一、小说中的纽约历史再现

多氏共写有12部长篇小说。其中, 只有《欢迎来到艰难时代镇》(Welcome to Hard Times, 1960)和《大进军》(The March, 2005)与纽约关系不大, 几乎其他所有作品都以纽约为背景, 关注纽约城市本身的发展、书写普通纽约人的生活。在小说中, 多氏以小人物为基点, 建构了一部纽约的大历史, 从19世纪中期一直延伸至当今。其纽约历史构型可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世纪中晚期, 即内战之后美国镀金时代初期的纽约, 主要呈现于小说《供水系统》(The Waterworks, 1994)中。多氏研究者米歇尔·托卡茨克(Michelle Tokarczyk)在《E.L.多克托罗对怀疑的专注》(E. L. Doctorow's Skeptical Commitment, 2000)一书中专辟一章, 讨论多氏在该小说中如何将纽约作为一个

收稿日期: 2015-11-08; 修回日期: 2015-12-28

基金项目: 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一般项目“E.L.多克托罗的后现代都市书写研究”(1F15305005); 上海理工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都市漫游者理论和相关文学批评实践”(1D-15-305-008)

作者简介: 袁源(1981-), 女, 江苏南通人,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美国文学

角色(character)而非仅仅是背景(setting)来对待。小说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对纽约建筑与纽约人的描述,揭露出纽约在镀金时代早期政治腐败、盲信科学的历史现实,并通过各种后现代写作技巧讽刺了纽约社会的随意性、断裂性与不确定性。有意思的是,小说以纽约的两场婚礼结尾。托卡茨克认为:这一结尾“暗示了干预城市的恶劣环境及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可能性”^{[5](167)},呈现出对纽约的未来乐观的一面。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使得纽约在这一时期经历着社会巨变,而小说则呈现出纽约在镀金时代早期的这一现实情形;可以说,在后现代写作技巧的掩盖下,多氏实际上进行着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实践。

第二阶段是20世纪头十年,即镀金时代晚期的纽约,主要呈现于《拉格泰姆时代》(*Ragtime*, 1975)^①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移民涌入纽约,为该小说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多氏在小说中再现了纽约诸多社会问题:黑人平等权、纽约下东区犹太移民的身份认同、妇女解放问题等,其对纽约都市形象的刻画丰满而有力。有学者认为,多氏的这部作品与《供水系统》类似,具有“新现实主义视域”^{[6](112)},或与《大进军》一样,可被视作“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7](55)}而该小说同样以喜剧模式结尾:美国白人女性与犹太男性移民通婚,犹太小孩与美国白人小孩和黑人小孩同住一个大家庭。正如琳达·哈琴在《后现代诗学》(*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1988)中所言,这三个家庭合而为一的事实是对原白人家庭的“去中心化”,而该小说也因此成为“美国都市人口构型的寓言”^[8]。

第三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及二战前夕的纽约。多氏似乎特别钟情于这一时间段的纽约的社会风情。小说《鱼鹰湖》(*Loon Lake*, 1980)、《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 1985)和《比利·巴思格特》(*Billy Bathgate*, 1989)均以这一时期的纽约为背景展开。或许是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大萧条的孩子”^②,所以这三部小说均以大萧条时期的少年为叙述者,直接展现在经济衰退大潮中纽约普通家庭的挣扎,以及普通纽约少年的成长经历,以一种近似“幼稚”的方式展露出他们对于美国梦的追求以及对于都市未来的憧憬。

第四阶段是20世纪中期的纽约,主要见于多氏第三部小说《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 1971)。该小说以麦卡锡时代真实的历史事件——罗森堡审判事件为原型,揭露国家政治给个人成长带来的心理创伤。该小说被认为是多氏小说中政治性最强、对纽约当局以及美国政府批判力度最大的一部小说。与上面提到的三部小说一样,该小说也以纽约小男孩为主要叙述

者,从个人成长的视角展现出纽约在20世纪中期的变迁。与上述作品不同的是,该小说中以但以理和其妹妹苏珊为代表的1960年代的新左派与以其父母为代表的旧左派之间的对话增强了小说对纽约政治的批判性以及“冷战狂想症”和“越战思维”的有力抨击。

最后一个阶段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纽约。小说《上帝之城》即是在新千年伊始对纽约的总结与展望。小说中指出:纽约是“文学艺术之都”,但也是“虚伪之都”;纽约是“人们不工作就大量挣钱的都市”,也是“人们一辈子工作最后破产的都市”;它是一个“音乐汇聚的都市”,但也是一个“连树都筋疲力尽的都市”^{[9](10)}。小说中满含作者对纽约都市现实与本质的思考,作者犹如“一个电影艺术导演”,游荡在纽约的各个角落,“挑选着场景”^{[9](8)}。小说中对纽约都市景观的大量描写旨在证明纽约的都市格局事实上在19世纪已经确定;对纽约的双重认识反映出以作者为代表生活在纽约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一方面他们因为纽约浓厚的文学艺术气息而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又由于生活成本急剧增加、人际关系不断异化的问题而对自身以及这个城市的未来感到深深的担忧。小说《纽约兄弟》(*Homer and Langley*, 2009)同样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从居住在纽约第五大道的纽约上流社会兄弟俩的视角,描绘出从20世纪初直至1970年代的纽约历史画卷。他的第二部小说《大如生活》(*Big As Life*, 1966)是一部科幻小说,一个比帝国大厦还高大的裸体巨人突然出现在纽约城,给市民带来无比的恐惧与不安。而最新小说《安德鲁德的大脑》则将“9·11”事件前后的纽约作为一个隐形的背景,指出,该事件如地震、海啸、核泄漏一样成为阻碍人类文明进程、挫败人类幸福感的黑手之一。至此,作者对纽约的文学再现已经与一种基于全球化基础上的世界主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在上面提到的十部小说中,多氏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展现了纽约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历史变迁。他擅长用历史作为其小说写作的题材。而在创作时,他又故意混淆小说与历史的界限,积极地进行各种文类实验,自传、侦探小说、犯罪小说、成长小说等都被混杂地运用于其后现代都市书写中。通过梳理这些作品,我们发现,多氏对纽约的历史再现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小说人物对纽约建筑等都市景观异常敏感,小说中往往有大量相关描述;二是小说人物并不局限于犹太移民,多氏关注纽约黑人以及爱尔兰裔移民,也关注美国白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他所关注的,是各种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是如何在这个国际大都市共生共存的情况;三是他往往在小说结尾展露

出一种积极的城市观,而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把城市认定为渎神的场所或文明的终点。他小说中的纽约既为少年犯罪同时也为个人成长提供了可能性,他在作品中往往透露出对都市未来的憧憬以及对实现这种憧憬的可能性的肯定,也就是说,他往往创造出一种既带有批判性又具有乌托邦特质的都市美学。

二、纽约文化地图的绘制

作为犹太作家,多氏十分关注犹太移民在纽约落脚、奋斗和发展的过程。据欧文·豪(Irving Howe)统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33年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东欧犹太人因不堪迫害而背井离乡,移民到美国。他们中的多数人选择在纽约东低部落脚。”^[10]这里的“东低部”,即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区”(Lower East Side of Manhattan)。但是多氏小说的主要背景却不在这里,而是在“布朗克斯区”(The Bronx)。究其原因,正如上文所言,多氏所关注的不仅是第一代犹太移民在美国落脚的过程,而是在聚焦第二代、第三代犹太移民生活现状的同时通过倒叙回溯他们父辈及祖辈的生活境况。对于布朗克斯与下东区的关系,多氏也多次在小说中予以暗示:“下东区是第一代犹太移民挣扎着落脚的地方”,“在1900年前后,有些犹太移民会搬到布朗克斯,从而逃离下东区。”^[11]在《世界博览会》中,犹太男孩埃德加的母亲坦言:“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父亲把我们带到了布朗克斯,但是没想到整个下东区都跟过来了。”^{[12](48)}可见在第一代移民中就已经有一种“逃离”的冲动。小说《上帝之城》中则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在那世纪初的布朗克斯
街道又宽又新,公园里的树还很小
花岗岩镶墙的红砖公寓楼
带有小院子
干净而救赎的
给设法从下东区可怕的破房子
逃出来的移民家庭住”^{[9](149)}

如果说纽约下东区是初到美国的第一代犹太移民暂时落脚、建立犹太移民社区的地方,那么布朗克斯则是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多的犹太后裔逃离原生家庭或原生社区而成长、生活,并在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协商适应过程中形成自己作为犹太人和美国人双重身份的场所。多氏作为第三代移民,就出生在布朗克斯,在这里成长、接受教育,自然对于这里的生活现实也更加熟悉,而他把小说的故事空间置于布朗克斯本身

也是对纽约下东区的一种“逃离”。

多氏虽然对下东区选择了“逃离”,但是对于曼哈顿这个整体仍持肯定态度,甚至在小说中也流露出褒曼哈顿而贬布朗克斯的倾向。在被公认具有高度自传性的小说《世界博览会》中,与作者同名的小主人公埃德加认为“相比曼哈顿而言,布朗克斯什么都不是”;他直言“我觉得在布朗克斯什么都不会发生”。^{[12](155)}在一部被认为也具有自传性的小说《比利·巴思格特》中,15岁的纽约布朗克斯街头少年比利也认为,相比曼哈顿而言,布朗克斯又偏僻、又破落又没个性,“每次我们在公园大道的仓库附近转悠时,我不是说富裕而具有传奇色彩的公园大道(位于曼哈顿),而是布朗克斯的公园大道,一个蹩脚的、充斥着垃圾和一层楼的机器商店的了无个性的街道……”^[13]这两个纽约男孩同时带有作者的影子,而他们都对曼哈顿的繁华景观艳羡不已。他们仰视第五大道的奢华,沉迷于帝国大厦带给他们的安全感和都市认同。在他们眼中,曼哈顿是位于纽约“中心”的繁华地带,而布朗克斯只是一个“边缘性”的“落后”的地方,甚至曼哈顿的医生都比布朗克斯的医生医术高明。

当然,如果聚焦布朗克斯内部,多氏也另有看法。他不喜欢布朗克斯东部(The East Bronx),因为那里常有黑帮男孩出没;而布朗克斯大道(The Bronx Avenue)的市场和克雷尔蒙特公园(Claremont Park)附近则被他描写成果蔬充实、生活气息浓厚的地方。段义孚曾指出:地方(place)不同于空间(space),地方是空间的组成部分,地方是空间中的一种“停顿”,而“一个个的地方与其他的物体共同构成空间,并赋予其几何特性”。^{[14](17)}段在另一本著作中还指出,人对一个地方的喜爱、眷恋或难以割舍的感情被称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而相反,人对于一个地方的逃避、憎恨或者恐惧被称为“厌地情结”(topophobia)。^[15]加斯顿·巴什拉虽然没有明确区分“地方”与“空间”两个概念,但也提到了“恋地情结”,并认为这种情结有助于提升幸福感和安全感。^[16]通过综合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多氏对于纽约都市空间的不同地方存在着不同的态度,他对纽约下东区存在着一种“厌地情结”,并试图“逃离”这个早期犹太移民的“落脚地”;他对于繁华的曼哈顿有着一一种“恋地情节”,鉴于他的犹太移民身份,这暗示着他想冲破边缘,进入美国文化的中心或主流的心理动机;而对于布朗克斯则是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他喜欢这里“家”的感觉却又对该社区的黑暗面看得十分透彻。他对纽约都市空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决定了他小说中的空间布局,也影响了小说人物对纽约的空间感知与心理体验。

三、作家的都市认同

为什么多氏的后现代书写聚焦于纽约这个城市？为什么他要展现各种人群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百态？多氏在接受采访时说：“所有的作家都会为自己寻找一个地方，作为他们想象的家园，我想，我的就是城市。”^{[17](202)}而他所指的城市，即纽约。他坦言：

对于一个即将成为作家的人来说，生活在美国文化的前沿是极其幸运的事。纽约为孩童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经验。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几乎每周都去现代艺术博物馆……那些从欧洲来的难民移民为纽约的文学评论、哲学以及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启发。而我为自己是一个纽约人而感到无比幸运。^{[17](201)}

多氏所写的，正是“被伊迪丝·华顿所遗忘的，也就是普通纽约人的生活”^{[5](156)}。如果说华顿的笔触及更多的是纽约上层阶级的贵族人群，那么多氏关注的则是纽约中下层人们的生活百态；如果说华顿聚焦的是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那么多氏则更致力于让人们感受到美国的犹太移民、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人群在纽约这个移民城市的挣扎，以及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质询，对于“美国性”的探究。段义孚曾指出：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东北部沿海地区是美国的门户，是美国历史发源的地方，而纽约这个城市则被认为是美国的“大前门”，这不仅是因为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它的“门户形象”，因为无数美国移民就是通过这一“门户”而进入美国这块“应许之地”的。^{[14](42)}作为犹太移民第三代，生于斯长于斯，可以说多氏对纽约的认同，始于他的青少年时代。如上述引文所说，他已经超越了他的祖辈和父辈，不只是将纽约视为进入美国这块“应许之地”的必经之路，而且还将它视作美国文化的前沿阵地。而他对这个城市的空间感知，以及多年在这里的生活经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例如，他个人对都市建筑非常敏感，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对纽约的都市景观也非常敏感。多氏称：“我对这个城市的建筑的兴趣，不仅限于供水系统和水库，我对孤儿院也很关注，对曼哈顿的网格布局亦是如此。”^{[17](204)}的确，其小说中有多处对建筑的细致描写，例如《但以理书》中但以理在布朗克斯被孤立的房子、《世界博览会》中1939年世界博览会的建筑群、《比利·巴思格特》中比利家对面的孤儿院等等。多氏甚至将多部小说的重要情节安排在纽约的孤儿院、地下室等比较特殊的地方。正如其所言，“小说叙述者都透露出这一观点——建筑能不可

避免地表达出一种文化的令人震惊之处”^{[17](204)}。纽约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成为他写作小说的素材，成为他记录这个城市人群生活现实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他诠释这个城市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小说也往往透露出他对这个城市强烈的认同感，展现出他作为一个纽约作家的独特视角。

四、都市漫游者眼中的纽约

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重点刻画了巴黎的“都市漫游者”这个形象。这个不确定形象是巴黎街头游手好闲的闲逛者，可以是资产阶级文人、无产阶级作家，也可以是诗人或者小说家。这样的都市漫游者同时也是寓言家，亦如波德莱尔，亦如本雅明自己。他们看似在都市中闲逛，却实施着各自的相面术(Physiognomy)^{[18](60)}；他们淹没于人群，却不是人群中的普通人^{[18](420)}。正如《上帝之城》中写道的：“我真正的家是城市的街道。我在街道上行走。”^{[9](102)}多氏犹如一位本雅明所说的都市漫游者，“在城市里游荡，像一个电影艺术导演一样挑选着场景”^{[9](8)}。值得强调的是，多氏不仅是在共时性维度中基于纽约都市空间的漫游，而且是在历时性维度中基于纽约历史进程中的漫游，因而他的作品呈现出一幅亦此亦彼、融古通今的纽约生活画卷。梅尔文·布克伊特(Melvin Bukiet)认为：把多氏的所有作品联系起来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纽约”。^{[19](23)}如上所述，多氏的诸多作品都在书写一个城市，即纽约。因而，将“纽约作家”之名冠之于他，丝毫不为过。

对于多氏而言，建筑是纽约都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孤儿院，还是帝国大厦，无论是供水系统还是城市公园；而人群也是纽约都市景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上帝之城》中，他借叙述者小说家艾弗瑞特之口道出关于城市起源的观点：“尽管我们谨慎而冷漠地协调着我们的公共空间，我们其实依赖周围的人群来描述自己。城市也许起源于一个市场，一个物品交易站，或是几条水流的交会处，但它暗地里也起源于人类想在陌生人群中行走的需要。”^{[9](11)}而多氏这个对文化事件异常敏感、对政治历史高度关注的“人群中的人”，带着他寓言家的目光和思维方式，行走于纽约的大街小巷，打量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并记录下普通纽约人生活的点滴。除此之外，多氏小说还十分关注纽约少年的成长问题。《亚特兰大宪法报》的书评称：“多克托罗之于纽约，正如狄更斯之于伦敦。”《但

以理书》《鱼鹰湖》《世界博览会》和《比利·巴斯格特》这四部小说都以纽约男孩为叙述者，从个人成长的视角展现纽约在20世纪中期的历史变迁。而且，这几部小说都被公认为具有较强的自传性，特别是《世界博览会》，主人公的名字即作者自己的名字。多氏作品研究者布鲁斯·韦伯(Bruce Weber)就指出，该小说与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相似，他认为，“多克托罗对纽约布朗克斯的运用与乔伊斯对都柏林的运用如出一辙”^[20]，而多氏则假借小说主人公埃德加之名，绘就了自己作为艺术家在纽约的成长之路。他对纽约的都市书写为他作为犹太人和美国人的双重身份加上了第三种身份，即“纽约人”身份。当然，他对于这个城市的本质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没有如菲茨杰拉德和多斯·帕索斯那样极力描述纽约的纸醉金迷、人情冷漠或者精神空虚，没有如保罗·奥斯特那样把纽约描写成一座迷宫，夸大它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也没有如德里罗和麦凯恩那样放大“9·11”恐怖袭击带给纽约人的精神创伤和心理绝望。他对纽约的文学想象更加接近普通纽约人的生活现实。

如前所述，他的多部小说都以喜剧结尾，暗含了“人总是要积极地面对生活”的潜台词。在他的作品中，纽约不仅是犯罪与堕落之地，也为少年成长并走向成熟提供了无限可能。他在作品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都市美学。作为“大萧条的孩子”，多氏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纽约情有独钟，多部小说都以此为时空背景。正如奥康纳所言，虽然大萧条给人们带来黑暗与沮丧，但是纽约却准备让她的年轻人成功地面对生活^{[3](227)}。在多氏小说中，即使在大萧条岁月，人们仍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中，纽约人仍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种于困境中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在当下仍具有启迪意义。不同于奥斯特、品钦和德里罗，多氏在后现代小说与积极的都市观之间建立了联系，打破了囿于后现代小说之上的“彻底的批判性”和弥漫在后现代小说上空的各种悲观思想，而这也正是多氏的都市书写与众不同之处。

五、结语

多氏通过作品建构了一幅纽约的文化地图，书写了一部纽约的文化发展史。迈克·克朗指出：“关于一个城市的文学文本建构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地图，这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21]多氏作品中的纽约不仅是犹太人在美国落脚、成长与繁衍

的门户城市，他的小说人物涉及各种纽约人，特别是黑人、爱尔兰裔及意大利裔的移民。小说《拉格泰姆时代》则融合了黑人争取民权、犹太裔移民初到纽约的文化适应以及纽约当地白人家族的历史变迁，小说结尾处白人女性与犹太男性移民通婚，犹太小孩与美国白人小孩和黑人小孩同住一个大家庭。对多氏而言，纽约之美，关键就在于相同都市空间中不同文化的“临界”状态，在于不同文化之间如何协商共存的情况，具有一种“地方性的世界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特征，它源自“由移民、本国人和少数族裔流散者共同组成的新世界”^[22]，即霍米·巴巴所说的“第四世界”，是多种文化混杂的结果。^[23]这种相同的都市空间中不同文化的临界状态既具有“历时性”，而这又正是纽约如今的都市现实，因而同时伴随着“共时性”。多氏把握了这一都市历史与都市现实，因而他的作品不仅具有醒目的“犹太性”特征，同时也具有这种“世界主义”特征。以往对多氏作品的评价多局限于他的犹太主题或政治历史叙事研究，而对多氏的纽约书写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这种“混杂性世界主义”特征讨论较少。因而，“文化地理学”这一批评视角将对以往从新历史主义、族裔、宗教、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多氏作品研究形成有力的补充，从而拓宽对他的研究视野。在全球化趋势日趋紧密、“世界城市”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研究作家都市书写的文化内涵具有广阔的现实意义。

注释：

- ① 迄今，该小说在国内共有三个译本，分别为：陶洁译：《雷格泰姆音乐》，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常涛，刘奚译：《褻褻时代》，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雷立美译：《乱世之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由于“拉格泰姆”(Ragtime)是指美国在一战前流行的一种黑人爵士乐形式，而本小说的时间背景正值这种音乐形式盛行的时代，因此本文作者认为译成《拉格泰姆时代》更妥。
- ② 多克托罗生于1931年，在大萧条时代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大萧条的孩子”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G·H·埃尔德(G. H. Elder, Jr.)的著作名。该书以1920—1921年出生组为研究对象，认为大萧条不仅影响了研究对象孩童时期的生活环境，而且对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思维方式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M]. 张旭东编，陈清侨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2] 杰西·祖巴. 纽约文学地图[C]// 薛玉凤，康天峰译. 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61.

- [3] O'Connell, Shaun. Remarkable, Unspeakable New York: A Literary History [M]. Boston: Beacon, 1995.
- [4] 李战子, 韩秉建. 译序[Z]. 上帝之城. 埃德·劳伦斯·多克托罗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1.
- [5] Tokarczyk, Michelle M E L. Doctorow's Skeptical Commitment [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0.
- [6] 李顺春. 历史与现实:《拉格泰姆时代》的新现实主义视域[J]. 当代外国文学 2011(3): 112-119.
- [7] 王守仁, 童庆生. 回忆 理解 想象 知识: 论美国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J]. 外国文学评论, 2007(1): 48-59.
- [8] Hutcheon, Linda.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88: 61.
- [9] 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 上帝之城[M]. 李战子, 韩秉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10] 乔国强. 美国犹太文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39.
- [11] Doctorow, Edgar Lawrence. The Book of Daniel [M]. New York: Penguin.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1971 by Ballantine, 2006: 124.
- [12] Doctorow, Edgar Lawrence. World's Fair [M]. New York: Random.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1985 by Random, 2007.
- [13] Doctorow, Edgar Lawrence. Billy Bathgate [M]. New York: Penguin.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1989 by Random, 1998: 22.
- [14]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77.
- [15] Tuan, Yifu.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M].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0: 4.
- [16] Bachelard, Gaston. The Poetics of Space [M]. Trans. Maria Jolas. New York: Orion, 1964: xxxi.
- [17] Tokarczyk, Michelle M. The City, The Waterworks, and Writing (1995) [C]// Conversations with E. L. Doctorow.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9.
- [18] Benjamin, Walter. The Arcades Project [M]. Trans. Howard Eil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99.
- [19] Bukiet, Melvin. Stations of the Cross [J]. The Nation. 2000, 270(2): 23-26.
- [20] Fowler, Douglas. Understanding E. L. Doctorow [M].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2: 142.
- [21] Crane, Mike. Cultural Geography [M]. London: Routledge, 1998: 47.
- [22] Bhabha, Homi K. Preface to the Routledge Classics Edition [Z].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 1994. Routledge, 2004: xvi.
- [23] Gilbert, Bart Moore. Spivak and Bhabha [C]// A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Studie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460.

On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E. L. Doctorow's New York writing

YUAN Yuan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Most fictional works by the American postmodern writer Edgar Lawrence Doctorow are set in the New York City and depict the life of ordinary New Yorkers. The present essay, by applying relative theor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aims at exploring the way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octorow's city writing and how the author draws a cultural map of New York from his own perspective. It tends to disclose the reasons why Doctorow seems to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Manhattan, the Bronx and the Lower East Sid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octorow actually wants to combine being a Jew, an American and a New Yorker as a trinity in his own cultural identity. Besides, what he concerns is not merely life of Jewish immigrants in New York, but rather how people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co-exist in this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us, his works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 proposed by Homi Bhabha, and display a special urban aesthetics, which might make him distinct from other postmodern writers in America.

Key Words: E. L. Doctorow; space; cosmopolitan; New York; Cultural Geography

[编辑: 胡兴华]